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多维分异与影响机理分析

——以苏州市为例

李明哲 汪德根 蒋媛 崔靖婕 郭武鑫¹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目标。基于农民工市民化满意度调查数据, 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回归方程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 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经济收入、心理认同、家乡环境、居住状况以及社会融入等 6 个维度构建评分系数矩阵, 探究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多维分异特征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 ①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处于低水平或较低水平; ②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各个维度发展不均衡, 存在着明显差异; ③社会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外部驱动力, 其中经济收入情况是市民化程度的基本动力, 居住情况是市民化发展的基础条件, 职业类型是主导因素; ④个人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内部驱动力, 其中年龄和市民化年限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根本体现, 子女因素是潜在推动力, 生活支出为非敏感因子, 可以通过经济收入和职业类型与市民化程度间接关联。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 多维分异特征 影响机理 苏州市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在我国城镇建设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城乡社会空间也处于不断转型、重构的演变进程中。为了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户籍制度, 政府不再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1], 并将城镇化列入了国家发展战略。然而,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后, 由于文化水平、经济差异、社会背景等因素, 许多城市和地区的农民工都处于“半城市化”的水准。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在城市获取合法身份, 更重要的是让农民工逐渐从身份、地位、生活逐步融入城市社会^[2]。但是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仍面临着许多问题^[3], 如“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只能维持城乡‘两栖人’的生活状态”等^[4,5]。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若要彻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需要科学构建评价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指标体系^[6,7], 因此, 本研究从农民工的居住状况、经济生活、社会融入、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 6 个维度建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度的指标体系, 明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并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以人为本”, 力图构建高质量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此, 深度开展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市

¹**作者简介:** 李明哲(1999—), 男, 江苏苏州人, 本科生在读。汪德根(1973—), 男, 安徽歙县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城乡发展与区域规划。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2010285022)

民化研究，具有凸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评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1 研究设计

1.1 案例地概况

苏州市位于长三角中部，是江苏省南部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华东地区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之一。截至 2019 年 11 月，在苏流动人口规模累计达 1225.8 万人，日均 259.9 万人，流动人口已逐渐成为城市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外流动人口吸引力最强的地点位于苏州主城区边缘区域，其他区域相对较弱，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工业聚集地区为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结构。因此，调查地点选取了苏州市城湾村作为研究案例。

城湾村位于姑苏区与工业园区的交界处，是葑门地区规模较大、水乡村落肌理较为典型的城中村(图 1)。村内除宅基地外的土地已于 20 世纪 90 年代被出售给国有企业，但宅基地使用权仍属原居民^[8,9]。城湾村的户籍人口多为中老年人，他们与外来人口形成房屋租赁的契约关系，除此以外在生活上联系甚少。此外，该地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全，道路狭窄、坑洼、破损严重，路旁历史遗留违章搭建较多，占道经营现象严重，场地内近九成以上是外来务工的居民，居住情况较为稳定，具备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性与典型性的条件。

1.2 数据采集与样本概况

1.2.1 数据采集

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基于此次调查研究的需求，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感知度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第二部分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感知调查，其中包括对于市民化指标满意程度与市民化活动频数的评价。在问卷设计的第二部分，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将问题的答案设置为 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5 个等级指标，反映作答者关于该问题的认同度的回复。调研团队先后 4 次对于苏州市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总计发放问卷 328 份，通过回收、审核共获得有效问卷 320 份，有效率达到 97.5%。调查主要采取区分时分组等量调查法，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在不同地区对农民工进行随机调查，以确保能够获得最全面的信息数据。

1.2.2 样本概况

基于调查结果，将收集的农民工样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固定工作，工资稳定，且享有一定社会保障的人；另一类是工作收入不固定，甚至是无业、无任何社会保障的人。以上两类人可以作为苏州市农民工的两种普遍类型，反映出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多维分异。



图 1 案例地区位

1.3 研究方法

利用 SPSS25.0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第一步，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中所涉及的 20 个变量进行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检验结果可知，本研究中 KMO 值为 0.712，大于 0.7，且 P 值小于 0.05，适合做因子分析。第二步，对上述结果进行主成分分析，选取最大迭代次数 25，初步归纳出 6 个公因子，并得出各个维度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根据结果显示，本研究累计贡献率为 61.147%，视为可靠结论^[10,11]。第三步，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求得 6 个公因子的载荷矩阵，将上述 14 项指标的函数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再将各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与实际权重相乘，得到各项指标的平均值及全市农民工市民化综合得分。第四步，将这 6 个公因子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One-way ANOVA)，检验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是否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来判断农民工市民化结果的影响机理及成因^[12]。

2 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特征

2.1 因子分析结果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提取 6 个公因子(表 1)，其中，“您参加过当地的社区选举”“您经常就时事发表评论”和“您参加过工会/党团组织的活动”在公因子(ζ_1)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政治参与因子；“您对工伤保险的满意度”“您对目前社会保障条件的满意度”和“您对目前工作条件的满意度”在公因子(ζ_2)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经济收入公因子；“您认为自己属于本地人”“您愿意一直生活在苏州”和“您愿意把户口迁到苏州”在公因子(ζ_3)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心理认同因子；“您因父母年龄大需要赡养离开苏州”和“您因家乡的回乡吸引政策离开苏州”在公因子(ζ_4)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家乡环境因子；“您满意目前的居住环境”“您满意目前的社区和周边环境”在公因子(ζ_5)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居住状况因子；“您遇到困难时寻求社会的帮助”在公因子(ζ_6)上存在较大的载荷，将其命名为社会融入因子。

2.2 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

为研究各个不同指标对于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贡献度，对 6 个公因子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6 个公因子的权重依次为 20.90%、19.65%、16.19%、15.83%、15.12%和 12.31%，得出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评价得分的公式为：

$$ZF=20.90\% \zeta_1+19.65\% \zeta_2+16.19\% \zeta_3+15.83\% \zeta_4+15.12\% \zeta_5+12.31\% \zeta_6$$

$$=2.281x_1+1.630x_2+1.054x_3+1.331x_4+2.752x_5+1.819x_6+2.241x_7+2.877x_8$$

$$+1.949x_9+1.579x_{10}+3.016x_{11}+1.791x_{12}+0.939x_{13}+2.476x_{14}$$

表 1 市民化因子分析结果

感知因子	因子负荷	公因子反差比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A 系数
政治参与(ζ_1)			2.597	12.780	0.241
(1) 参加工作单位的工会/党团组织活动(x_1)	0.670	0.571			

(2)您经常在网上就社会事件、国家事务发表意见(x ₂)	0.692	0.548			
(3)参加过当地的社区选举(x ₃)	0.740	0.599			
经济收入(ξ ₂)			1.469	12.014	0.479
(4)您满意目前的工作条件(x ₄)	0.727	0.561			
(5)您满意目前的工伤保险(x ₅)	0.596	0.566			
(6)您满意目前的社会保障条件(x ₆)	0.723	0.559			
心理认同(ξ ₃)			1.232	9.897	0.249
(7)您愿意把户口迁入苏州(x ₇)	0.665	0.546			
(8)您认为自己属于本地人(x ₈)	0.600	0.497			
(9)您愿意一直生活在苏州(x ₉)	0.728	0.616			
家乡环境(ξ ₄)			1.175	9.679	0.352
(10)您因家乡的回乡吸引政策离开苏州(x ₁₀)	0.784	0.670			
(11)您因父母年龄大需要赡养离开苏州(x ₁₁)	0.802	0.685			
居住状况(ξ ₅)			1.075	9.248	0.51
(12)您满意目前的小区 and 周边环境(x ₁₂)	0.745	0.601			
(13)您满意目前的居住环境(x ₁₃)	0.760	0.661			
社会融入(ξ ₆)			1.012	7.529	0.414
(14)遇到困难时寻求亲朋好友的帮助(x ₁₄)	0.925	0.882			
累计贡献率				61.147	
KMO 统计量				0.712	

表 2 各项指标实际权重与综合得分

指标	x ₁	x ₂	x ₃	x ₄	x ₅	x ₆	x ₇	总得分
权重	0.066	0.083	0.064	0.087	0.083	0.083	0.090	56.01
综合得分	43.95	61.35	57.90	56.25	57.95	51.60	69.01	
指标	x ₈	x ₉	x ₁₀	x ₁₁	x ₁₂	x ₁₃	x ₁₄	
权重	0.040	0.067	0.045	0.067	0.075	0.069	0.081	

综合得分	42.32	50.80	60.39	66.20	63.02	57.64	45.65	
------	-------	-------	-------	-------	-------	-------	-------	--

对保留的 14 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各个指标的实际权重，将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指标的平均得分与实际权重相乘，得出各指标平均值及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得分 56.01(表 2)，表明苏州市农民工整体市民化水平不高，还存在许多有待提升的方面。另外，不同指标之间差距巨大，其中得分最低的指标“您认为自己属于本地人”为 42.32 分，得分最高的指标“您愿意把户口迁到苏州”为 69.01 分，说明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多维水平分异明显。

2.3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总体特征

评价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整体情况，应该优先关注重要性较高的指标，即相对权重较高的指标。将归一化后得到的权重的平均值(0.076)作为横轴，反映出被测指标的重要性；市民化的综合得分的平均值(56.01)作为纵轴，反映出被测指标的综合得分情况。从而绘制 14 个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综合得分两个角度的四象限(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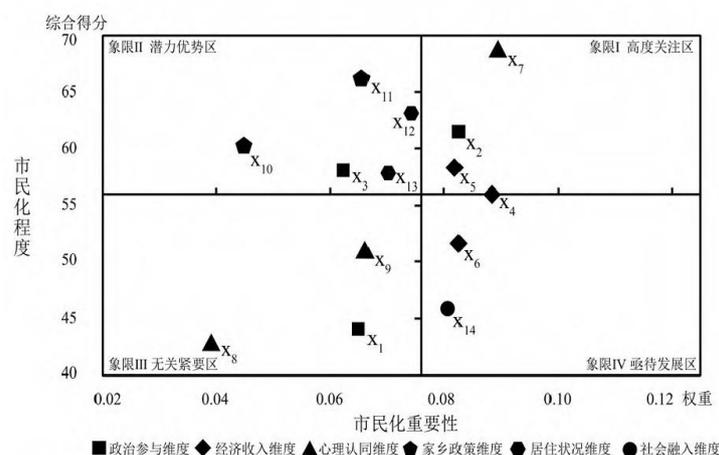


图 2 重要性—综合得分四象限

由图 2 可知，14 个被测评的指标有 3 个进入了第一象限“高度关注区”，分别是“参加过当地社区选举的频数(x_3)”“对社会保障条件的满意度(x_6)”和“您是否愿意一直生活在苏州(x_9)”。这些指标对于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农民工在市民化当中所最关心的问题。在第二象限优先改进区当中，有 5 个指标进入到了这一象限当中，主要集中在“心理认同”维度和“家乡环境”维度，这充分说明了在这两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整体来说较为良好但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农民工对于这两方面的期待程度较高。政府和社会需要增强农民工与本地社会的融入感以及为农民工提供更优惠的政策，从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中，分布了 6 个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综合得分变化影响较小的指标，其中无关紧要区分布了两项指标，隶属于“经济收入”公因子；维持优势区分布了 4 项指标，主要隶属于“居住状况”公因子。这表明经济收入已经不再成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态度的一项重要因素，而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大部分都较为稳定，居住状况市民化的得分较高，也反映出在整体市民化过程中，居住状况优先于其他维度的市民化发展的整体趋势。

3 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机理分析

为进一步构建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多维分异影响机理，首先，本研究选取了部分农民工的个人属性因素与个人行为因素(表 3)。其次，并将这 7 个影响因素根据属性归类，分别从子女因素(子女性别、子女上学情况)、农民工自身因素(年龄、市民化年限、职业类型)以及生活因素(生活支出、住房性质)案例地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运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相关分析，以探究这些变量对苏州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否产生影响以及产生的影响类型。最后，结合社会属性(生活因素)和个人属性(子女因素和农民工自身因素)双重层面，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所形成的影响机理。

3.1 子女因素的影响

表 4 子女因素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公因子		政治(ζ ₁)	经济(ζ ₂)	心理(ζ ₃)	家乡(ζ ₄)	居住(ζ ₅)	社会(ζ ₆)
子女性别	男孩	-0.348	-0.135	-0.206	-0.112	0.0479	0.168
	女孩	-0.201	0.381	-0.333	0.166	0-.278	0.230
	无子女	0.012	0.21	0.402	0.097	-0.089	0.045
	有一男一女	-0.383	-0.129	0.36	0.215	0.126	-0.122
	F	2.524	2.163	5.623	0.914	1.014	0.898
	Sig.	0.06	0.095	0.001*	0.436	0.388	0.444
子女上学情况	在苏州上学	-0.421	0.252	0.056	-0.179	0.525	0.173
	不在苏州上学	-0.225	-0.043	0.002	0.138	-0.185	0.057
	F	0.104	2.134	0.08	2.507	13.788	0.357
	Sig.	0.104	0.146	0.778	0.115	0.001*	0.551

注：“*”表示 p<0.05，下同

表 5 农民工自身因素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公因子		政治(ζ ₁)	经济(ζ ₂)	心理(ζ ₃)	家乡(ζ ₄)	居住(ζ ₅)	社会(ζ ₆)
年龄	16~25岁	0.124	0.428	0.681	0.061	0.094	0.004
	26~40岁	-0.260	0.346	-0.027	0.108	-0.088	0.211
	41~55岁	-0.371	-0.125	-0.203	0.093	0.048	-0.254
	56~60岁	-0.396	-0.640	0.206	-0.126	-0.034	0.408
	60岁以上	-0.202	-0.184	-0.063	0.053	-0.150	0.636
	F	2.238	4.403	2.892	0.186	0.205	3.175

	Sig	0.067	0.002*	0.024*	0.945	0.935	0.015*
市民化年限	0~2年	-0.386	-0.151	0.143	0.354	-0.222	0.036
	3~5年	-0.063	0.112	0.171	0.250	-0.044	0.135
	6~10年	-0.438	0.438	-0.021	0.231	0.375	0.074
	11~15年	-0.128	-0.230	-0.084	-0.115	-0.227	0.524
	15年以上	-0.273	-0.222	-0.060	-0.227	-0.190	-0.094
	F	1.945	2.715	0.381	1.877	2.177	1.245
	Sig	0.106	0.032*	0.822	0.117	0.074	0.294
职业类型	工厂职工	-0.045	0.130	-1.205	1.320	-0.747	0.221
	个体经营	-0.133	1.105	-0.175	-0.059	-0.238	-0.059
	服务业	-0.131	-0.086	0.449	-0.293	0.268	0.105
	工地务工人员	-0.217	-0.012	0.097	-0.021	0.139	0.126
	其他	-0.397	-0.391	-0.285	0.162	-0.301	0.031
	F	-0.359	0.267	0.112	0.425	0.130	0.188
	Sig.	0.414	0.001*	0.021*	0.109	0.140	0.978

子女因素中，包括子女的性别和子女上学情况。这两个影响因子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在“心理认同”和“居住状况”有显著性的差异表现(表4)。没有子女的农民工在生活中会减少负担和牵挂，使他们更想长时间在苏州生活；而拥有两名子女及其以上的农民工，生活压力会相对较大，使得这样的家庭需要更高的收入来源，而苏州市相比与农民工流出地来说工资水平较高，因此他们也更愿意留在苏州；因此，这两类群体从心理上对市民化更加认同。从“居住状况”公因子来看，“子女在苏州上学”得分较高，表明这类农民工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未来更想成为苏州市民，他们更愿意给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表3 市民化影响因子变量值的设定

影响因子	定义	赋值	影响因子	定义	赋值	影响因子	定义	赋值
子女性别	男	1	职业类型	工厂职工	1	市民化年限	0~2年	1
	女	2		个体经营	2		3~5年	2
	没有孩子	3		服务业	3		6~10年	3
	有男有女	4		工地务工人员	4		11~15年	4
				其他	5		15年以上	5
年龄	16~25岁	1	子女上学情况	在苏州上学	1	生活支出	生活日用品	1

	26~40 岁	2		不在苏州上学	2		医疗保健	2
	41~55 岁	3	住房性质	自购房	2		家用电器及娱乐	3
	56~60 岁	4		廉租房	3		交通及通信	4
	60 岁以上	5		移动板房	4		教育经费	5
				亲友房	5		赡养费	6

3.2 农民工自身因素的影响

农民工自身因素包括了年龄、市民化年限和职业类型三个影响因子。表 5 显示, 农民工自身因素在“经济”“心理”和“社会融入”等公因子中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 并且感知差异明显。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和“心理认同”的得分较高, 这类群体大多数为刚开始接触社会、正在创业或者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目前不存在“上有老, 下有小”的巨大压力, 并且认为工资水平、消费水平等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生活水平, 因此对经济状况因子感知明显; 同时, 这类人也不被束缚于“乡愁”中, 这就导致他们受到外来的拉力较小, 他们更容易长期留在城市当中。

此外, 由于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往往具备更快适应新生活方式的能力, 很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当中, 对整个城市的心理认同感更强。另一方面来看, 市民化年限在 6~10 年的农民工对经济因子的影响感知得分最高, 这类群体处于市民化的过渡期, 在他们看来, 目前的生活水平若要提升一个新阶段, 经济因素是最该考虑的问题。而 15 年以上的农民工往往已经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 返乡的可能性往往较小, 因此市民化程度达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

职业类型的差异也让农民工之间的市民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 个体经营的农民工对经济的感知得分最高。对于个体经营商户来说, 劳动成本与回报呈正相关关系, 因此经济水平越高, 他们更愿意在苏州的市场经营。在心理认同这一方面, 由于服务业人群经常与苏州本地人打交道, 他们的思想与文化上相互交流的频次很高, 他们也更容易也更愿意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去, 因此更加关注社会感知。

3.3 生活因素的影响

生活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也最能够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生活现状(表 6)。受限制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生活因素与经济收入维度的市民化有着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越高, 消费能力就越高, 经济状况往往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

农民工的住房性质直接影响着经济条件、心理认同和家乡环境等 3 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 住房条件与住宅环境的差异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三个维度的市民化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也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此外, 尽管一部分农民工的住房环境较差, 但由于家乡发展较为缓慢, 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住房条件仍然优于农村, 因此农民工更愿意留在苏州, 这也侧面反映了家乡政策和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负向相关性影响。

3.4 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影响机理

依据上述分析, 将各维度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 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的形成机理框架, 从个人属性来看, 子女因素、个人年龄、市民化年限和职业类型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的内部驱动力(图 3)。

(1) 子女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最主要因素，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农民工的去留以及市民化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形态。据调查显示，我国大中城市的农民工流动儿童已占儿童总数的 30%~40%，其中 18 周岁以下的农民工流动儿童占全部农民工人口的 19.7%。而在本研究中，26~40 岁的农民工占 31.2%，这类人群正值生育高峰，因此农民工子女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2) 个人年龄是农民工市民化不同阶段的差异表现。根据结果显示，农民工之间年龄跨度大，分布广，反映了农民工群体已经划分为一代农民工和二代农民工两个基本的年龄类型。一代农民工进城较早，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最基础的体力劳动，收入水平与本地市民存在着一定差距，市民化水平达到了瓶颈；二代农民工往往为外地大学生，或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一代农民工的子女，文化素质较高，能够承担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与本地市民差距有所缩小，因此市民化水平增长较快，市民化发展前景较好。

表 6 生活因素对市民化水平多维分异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公因子		政治 (ζ_1)	经济 (ζ_2)	心理 (ζ_3)	家乡 (ζ_4)	居住 (ζ_5)	社会 (ζ_6)
生活支出	生活日用品	-0.057	0.769	0.476	-0.381	-0.494	0.551
	医疗保健	-0.163	0.031	-0.705	0.356	0.455	0.391
	家用电器及娱乐	-0.023	0.903	0.173	0.252	-0.034	0.435
	交通及通信	-0.263	-0.456	-0.178	-0.122	0.156	0.201
	教育经费	-0.674	0.951	0.383	0.359	0.247	-0.315
	赡养费	-0.273	1.931	0.280	-0.382	-0.732	0.005
	F	0.813	14.909	1.248	1.775	1.638	0.977
	Sig.	0.562	0.001*	0.285	0.108	0.140	0.443
住房性质	单位宿舍	0.527	0.191	1.141	0.121	-0.496	0.519
	自购房	-0.068	0.577	0.759	-1.007	0.621	0.120
	廉租房	-0.316	-0.090	-0.076	0.169	-0.079	0.031
	移动板房	-0.059	1.238	0.557	-0.905	-0.784	1.519
	亲友房	-0.228	1.159	-0.194	-0.028	0.093	0.680
	F	1.580	2.710	2.672	3.487	1.676	1.074
	Sig.	0.169	0.022*	0.024*	0.005*	0.144	0.377

(3) 市民化年限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潜在体现。一般来说，市民化年限与市民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市民化年限越长，市民化水平往往就越高。但在一代农民工和二代农民工之间，市民化也存在着略微差异。一代农民工市民化年限较长，市民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和居住环境方面，满足了农民工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二代农民工虽然进城时间较短，经济基础没有一代农民工牢固，但他们更善于融入新群体和接受新鲜事物，更加注重人际关系，因此在社会融入和心理认同维度的市民化表现要高于一代农

民工。

(4) 作为农民工安家立业的基础，职业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先决条件。职业类型的差异决定了市民化程度的差异。劳动型职业工作环境单一，多为流水线工作，与社会的大环境趋于隔绝状态，因此农民工缺少横向对比，市民化的心理认同感较低；而服务型职业直接面向社会，较为复杂，会在社会融入维度有较大的提升。

从社会属性来看，住房属性和生活属性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分异的外在驱动力。

(1) 住房属性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一般来说，农民工有购房欲望一般具有两种决定性因素：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和子女的上学需求。无论是由于上述何种原因，农民工都渴望能够留在城市之中，因此需要一处安身之所。在市民化的六个维度中，经济收入市民化最先发生，而住房状况又和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关。因此，农民工的住房情况能够反映出其当前整体的市民化水平。是否具有购房能力，也可以简单看作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是否完全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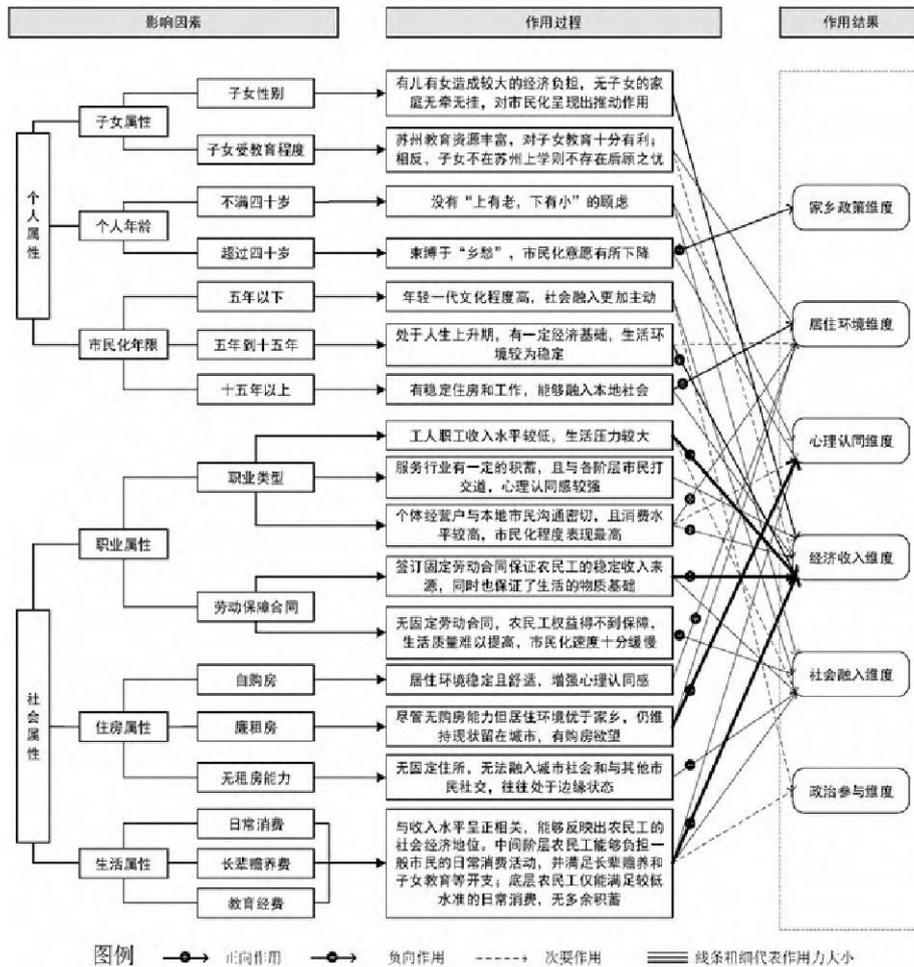


图3 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机理

(2) 生活属性即农民工日常消费水平，属于非敏感因子，但这一因子能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综合特征。由于体制关系，许多大城市的市民化都是“半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在身份上得到了市民化，但生活上并没有真正市民化。从农民工的日常消费构成

可以判断,农民工是否享有与本地市民平等的医疗资源、文体资源、交通资源等一系列公共设施。同时,教育经费和长辈赡养费两个市民化的反向拉力,促使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速度放缓。

4 结论与讨论

(1)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在6个不同维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差异,亟待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居住环境和经济收入两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暂时领先;社会融入、心理认同和政治参与3个维度的市民化得分偏低;家乡环境维度的市民化作为惟一的负向指标,对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力,是市民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2)社会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外部驱动力。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差异感知分析的结果表明,住房属性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起着关键的导向性作用,也是反映一个农民工家庭市民化程度的直接表现;生活属性能够体现出农民工在整个群体中的经济地位,反映了市民化的综合特征。

(3)个人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子女因素是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市民化的潜在推动力,决定着农民工的去留以及下一代农民工的发展情况;而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在纵向上呈现出市民化的多维分异;市民化年限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体现,“农一代”和“农二代”对于市民化的态度各有不同,同样导致了市民化多维分异的结果;而职业属性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先决条件,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直接相关。

本研究探究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多维分异及其影响机理,为政府及城市规划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社会人口政策、更加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能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多维协调发展,更加有效地提高市民化水平。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对其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城市社会融合和城乡发展的角度,开展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提供数据支持和同步监测,作为城市社会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程姝.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3.
- [2]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6-10.
- [3]魏婷,时匡.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J].农业经济,2019(12):50-51.
- [4]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3-23.
- [5]董延芳,刘传江,胡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J].人口研究,2011,35(1):65-73.
- [6]李荣彬,袁城,王国宏,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106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青年研究,2013(1):1-11.
- [7]沈映春,王泽强,焦婕,等.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3(5):138-143.
- [8]刘强.在地文化视角下城中村有机更新路径研究[D].苏州:苏州科技大学,2019.
- [9]石卉楠,汪毅.城市活力导向的城中村公共空间改造研究——以苏州城湾村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

府. 活力城乡·美好人居——201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2 城市更新) [M]. 重庆: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9.

[10]唐露.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融合影响因素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7.

[11]刘培森, 尹希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7, 30(1): 75-81.

[12]赵美风, 戚伟, 刘盛和.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理[J]. 地理学报, 2018, 73(8): 1494-1512.